

论金庸武侠小说正邪人物之“反”叙事模式

弥建立

(兰州大学,甘肃省广电总台电视新闻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30)

【内容摘要】在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创造性地对传统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颠覆与反拨,打破了好人坏人绝对对立的二元模式,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

【关键词】金庸小说 叙事模式 正邪之“反”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1-0104-02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中,他打破了好人坏人绝对对立的二元模式,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这特别体现在韦小宝身上,我们可以从他那里感受到金庸赋予正面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为邪派人物笔下留情,以及带有政治家的“仁爱”情怀。本文就将这个现象从几个视角对金庸的创作进行解析。

一、正邪之“反”叙事模式的形成轨迹

无论是旧武侠小说还是新武侠小说,人物形象形成了一分为二的类型和模式,一方为正面人物,即好人和善人;一方为反面人物,即坏人和恶人,人物形象呈现出非正即邪、非善即恶、非美即丑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这一模式下,人物性格趋于简单化,不能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金庸早期的小说作品中,对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判别和表现比较简单。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已经注意到将对英雄的“神化”转向“人化”,在杨过的成长历程上,设置了家族利益和民族利益相矛盾引发的内在冲突,个性解放和传统社会的礼教规范的外在冲突。《倚天屠龙记》最大的突破是对于“正邪”的融合和思考,从人性的层面上考察“正邪”矛盾。“魔教妖女”式的结合使张翠山身败名裂,而赵敏和周芷若等人的“改邪归正”过程也预告了正邪冲突在亲情和爱情前的融合。花铁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性遭遇环境的压力时呈现出的各种形态。乔峰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接受了“正”的汉文化,而有“邪”的契丹血统,是接受了汉族教化和汉族观念的契丹人。本性纯朴的小和尚虚竹和有道高僧玄慈可以抵制荤腥的诱惑,却无法压制对性和爱的渴望。令狐冲的独善其身成了无可奈何的悲凉。韦小宝这个不学无术的市井小人,各种欲望得到充分展现,将人性彻底解放,达到了人物性格之“反”的高潮。

对于这种“反”的飞跃,金庸在《鹿鼎记》修订版“后记”中明确强调:“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

二、人物正邪之“反”叙事模式的内涵

与中国传统文学中邪恶形象往往被脸谱化、类型化并且遭到了贬低的情况不同,金庸在正邪善恶的人物形象创作中,回避恶势力的强大,不掩饰恶的一方人物的高超技

艺,英雄与邪恶人物之间不仅是武技的斗争,还有道德上的龙虎相争。

对武侠人物来说,“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与士大夫、读书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除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节气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锐身赴难,以直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以“恻隐之心、公义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这“德之四纬”所代表的传统美德,是金庸写小说时辨别正邪人物设立的第一个标尺。使得一个原本以武力为导向的世界里,武的成份被道德所制约,即使在武艺上可以“从心所欲”,也不能逾越道德。洪七公的一番“道德训斥”使裘千仞无招架之力,天之骄子成吉思汗以累累白骨为代价来满足少数人的欲望,并不是英雄。如金庸所说“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

金庸在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中,“在传达中国文化精义的时候,也表现出一种向主流文化靠拢的努力”,用“义”来展示正邪人物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金庸的义气包括了理智的判断,“即使和一般人感情并不深厚,但为了‘应当这样做才合道理’”,“义”成为金庸小说中区分正邪人物的另一条标准。“义”不但存在于英雄侠士身上,也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甚至存在于邪恶的反面人物身上。

“义”在正面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是非常复杂的。萧峰、郭靖等顶天立地为国为民的“大侠”固然是“义”的积极履行者,“救人于困厄”的一般侠客如胡斐、胡一刀、苗人凤、红花会群雄等以义为最高标准,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心上,更加不屈于威武。令狐冲、杨过等个性主义者也是“义”的终身信奉者,甚至于韦小宝这样的“坏人”对皇帝还是皇帝的敌人——反清义士都讲“义气”,最后当矛盾不可调和时,他甘愿舍弃高官厚禄归隐,以保全他终身信奉的“义气”。

坏人或者是真正邪恶人物也同样具有“义”,不过只是出于小团体利益的或者是个人利益的“私利”,属于“小义”,如岳不群、余沧海、左冷禅、戚长发、万震山等,都是重个人私利的“义”,不讲对整个社会或江湖利益来说有利的大义,

不能归于“道德高尚”的正面人物之列,是作者极力否定的邪恶人物。

“从金庸的小说来看,他对儒家的‘仁’的思想,在总体上抱着认同的态度。”正面人物一般都具有“仁爱”思想,其武力行为也成为有仁爱思想的侠客不得不用手段,甚至有时要用生命去化解仇杀。正如金庸自己所说,“在我看来,真正的侠义行为,是自己没什么好处可得。”《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为了天下百姓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鸳鸯刀》中的主题就是“仁者无敌”,呼唤“仁”者(仁君)的出现。

在“反”的叙事模式下,《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之首的段延庆是一个有父子之情的“邪恶”人物。因失恋变态的李莫愁,也有本能的慈爱之心不杀尚在襁褓中的郭襄,是令人同情的邪恶人物。

在金庸小说中,“义”进一步内化后,就成为武侠人物规范自身行为的“信”,主要表现在对许诺的恪守,这不仅正派的侠义道要遵守,就是绝不论民族国家大义的反派人物也要遵循。欧阳峰违背了许诺而逼迫黄蓉,一听郭靖之声,还不免仓惶逃去。在《天龙八部》中,萧峰用自杀的方式,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去“惩恶扬善”,弘扬“仁”与“义”武侠美德。

在人物正邪可以分辨的大框架中,金庸也写到了不同程度意味含糊的人物,如周芷若、阿紫等,文本没有明确的性格指向,“他就是这样以一种宽容、理解人性自身矛盾的态度来描写他的作品”,特别是对“义”的向往,使部分邪恶人物也有少许亮色,令人有同情之心。

三、另类的阿Q:韦小宝

金庸表示“我想把他(韦小宝)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不好一面。”在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下,金庸在《鹿鼎记》中写人物性格的正中之邪,也表现人物性格的邪中之正。如果说在《鹿鼎记》以前的作品中,金庸对传统“侠”文化抱着基本赞同的态度并进行了歌颂,那么在《鹿鼎记》中,他开始了自己的质疑与反思,在对江湖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对武侠的态度由肯定转变为否定。

《鹿鼎记》中天地会、神龙教和政治组织沐王府等,为夺取权利争得你死我活。“侠义”在“利”的进攻下已走到了尽头,只在次要人物莽汉茅十八的身上,尚存留些许传统侠士的气概。在恶劣的生长环境中,“生存”成为韦小宝的第一需求,以利己为主的市井哲学成为韦小宝的人生准则,道德标准处于“零度线”上,为了生存,不得不使出在妓院中练就的拍马屁、耍滑头,使用人所不齿的“下三烂”手段,成为江湖和官场中都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表现出的厚颜无耻、好赌好色等令人触目惊心的丑陋行状,是对中国封建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真实而深刻的书写。

韦小宝身上的善与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定内在心理、外在关系里铸就的轨道中戏剧性地成长的。在以“利字当头”的市井哲学的进攻下,韦小宝戏院里听来的江湖“义气”连连后退,江湖“规则”对他的约束力越来越弱,除非通过反复权衡之后,觉得“遵守江湖道义”对他有利。堂堂正正的侠义精神完全不如利己主义的市井文化有用。

在江湖中行走的韦小宝,虽然唯利是图,有时也会变成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在人性 and 情感的冲突中制造出了高潮。在这种“道德”与“人情”的矛盾之中,我们看到了得到了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权力和命运的另类阿Q韦小宝的“善”。皇帝和皇太后为了掩盖宫内的丑闻,多次要将宫女太监和侍卫灭口,韦小宝多次保全了众人的生命。

韦小宝的出现,不仅影响到了金庸武侠小说中一贯的英雄形象,而且人物之间的善与恶、好与坏之间的界限也开

始模糊,出现了灰色地带。相比于鲁迅笔下的阿Q,韦小宝和阿Q都是“中国人的镜子”,他们同样都是小人物,阿Q是一个求“精神胜利”、而生命力萎缩的失败者,韦小宝也有很多缺点,但他也有突出的优点,比如,他的聪明、机灵。最后,韦小宝身上有限的野心和残存的“义”,被扭曲的个性中所未曾泯灭的人性和善良,使他全身而退。

四、人物正邪之“反”叙事模式形成的原因

金庸新闻、文学、政治相结合的独特经历,使他具备了政论家的“仁爱”情怀和小说家的想象力,为塑造各类人物的正邪性格增添了内涵。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的政论家,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以“新闻眼”的视角进行了映照。“我对小说特别留意它有无反映人性、社会、时代,因为任何真正伟大的小说,它们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方法来表达上述三点”。七十一岁的金庸曾说,“历史要放远来看,我理解的‘仁’,一是重视和平坚守和平,二是要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为政者以此为出发点,就是成功的政治。”

金庸钟情于用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备的优秀品质来塑造武侠人物。首先是从政者不能把政治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手段,真正的大侠也一样不能只为自己谋私利。《笑傲江湖》表达的就是这种思想,如岳不群、左冷禅等野心家没有一个好下场。第二是便是“仁爱”。郭靖死谏成吉思汗要为天下百姓而息兵罢战,萧峰以己一死来平息宋辽两国之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用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侠士。只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其境界不足为“大”。第三是果敢与勇气。面对江湖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在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时,要以天下义利为己任,死而后已,这正体现了“侠”的勇气,这是“侠”的本色。从金庸喜爱的正面武侠人物身上,从中可以折射出金庸的政治观与“侠”的最高理想是相通的,理想中的从政者的优秀品质,也是一个大侠的优秀品质。

金庸的小说中,历史人物变得有血有肉,他们身上有伟人的光辉,也有常人的弱点。《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心理矛盾与个性特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尽管不符合历史的真相,在人物的塑造上却是非常成功的。韦小宝的飞黄腾达,看似无稽实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却绝对存在,这是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悲哀。《碧血剑》中,对袁崇焕之死的情节,金庸采取学术论文的形式,让历史走出文学语境,重新恢复了历史自身的本来面目。《鹿鼎记》在对“反清复明”的质疑中完成了对历史真实人物康熙的正面褒扬和虚构人物韦小宝正邪难以言说性格的批判。

金庸以政论家仁爱情怀的“高度”、史学家深刻批判的“深度”和小说家丰富想象的“厚度”,塑造了各类正邪人物形象,描写了他们纷纭的不同性格,而他的小说不是武侠们之间难分难解的争斗史,而是正邪人物性格的交织史。

参考文献:

- [1]金庸.鹿鼎记[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年9月版.
- [2]金庸.金庸散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 [3]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出版社.
- [4]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 [5]愣头青.我偏爱看金大侠[N].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6日.
- [6]孔庆东.金庸评传[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 [7]傅国涌.金庸传[M].北京十月文世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